

# 斯大林时代 共产国际内幕

〔美〕赫尔穆特·格鲁伯著 达洋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斯大林时代 共产国际内幕

〔美〕赫尔穆特·格鲁伯著

达洋 译

中国展望出版社

**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

〔美〕 赫尔穆特·格鲁伯 著

达 洋 译

•

**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625

243千字 1989年10月 北京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1—3,000册

---

ISBN 7—5050—0005—5/D·2

---

定价：4.70元

##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赫尔穆特·格鲁伯是美国纽约综合技术学院历史学教授，对国际共运素有研究。本书写于1974年，由美国铁锚出版社出版。

在本书中，作者运用较多的历史文献资料（其中有未曾公开过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和记要），特别是一些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记录和托洛茨基档案中的若干资料，阐述了1924至1931年国际共运发展的历史，指出了共产国际和苏共在这个时期推行的摇摆战略，对欧洲各国共产党以及对殖民地国家人民的革命造成的影响。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国际共运的历史，特别是研究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都有参考价值。特翻译出版。

需要指出：本书作者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是片面的和错误的，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为此，希望读者在参阅本书时，请同时研谈《周恩来选集》第300页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我们也特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廖盖隆同志所撰写的书评刊于书首，作为代序。对读者有指导意义。

全书除个别章节删略外，均照原文译出。

## 目 录

赫·格鲁伯《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一书述评 (代序) .....	廖盖隆
<b>导 言</b> .....	( 19 )
<b>第一部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共产国际的布 尔什维克化</b> .....	( 23 )
第一章 新的方针：向左转 德国 .....	( 29 )
法国 .....	( 43 )
第二章 旧方针：向右转 .....	( 57 )
南斯拉夫 .....	( 57 )
英国 .....	( 73 )
第三章 第三时期：斯大林化的胜利 .....	( 90 )
<b>第二部分：共产国际和殖民地人民</b> .....	( 113 )
第一章 理论上的模棱两可：是自下而上的共产 主义，还是自上而下的反帝国主义？ .....	( 116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国际的殖民地政策的惨败： 序幕 .....	( 143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国际的殖民地政策的惨败： 结局 .....	( 177 )
<b>结 论</b> .....	( 230 )
<b>附件（文件）</b>	
一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	(237)
二 中共中央第一次关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0日） .....	(246)

三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摘要 (1922年7月) .....	(248)
四	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1922年11~12月) .....	(251)
五	卡尔·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 东方问题的评论”(1922年11~12月) .....	(255)
六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运动的提纲》 (1925年1月) .....	(257)
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 问题的决议”(1926年3月13日) .....	(258)
八	苏共政治局特别委员会“关于远东政策的决议” (1926年3月25日) .....	(262)
九	纳索诺夫、福金、阿尔布雷希特从上海致共产 国际执委会的信件(1927年3月17日) .....	(267)
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 形势问题的决议”(1926年12月16日) .....	(272)
十一	约瑟夫·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 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 .....	(276)
十二	利昂·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关 于中国问题的两次讲话(1927年5月18~26日) .....	(280)
十三	阿尔伯特·特伦：《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中国 问题小组委员会：讨论概要》(1927年5月) .....	(285)
十四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 的决议”(1927年7月14日) .....	(290)
	<b>参考读物</b> .....	(295)

责任编辑：朱 剑

# 赫·格鲁伯《斯大林时代共产 国际内幕》一书述评 (代序)

本书作者赫尔穆特·格鲁伯是美国纽约综合技术学院的历史教授。《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是他写的关于国际共产运动历史的三部著作中的第二部，1974年在美国初版。其他两部著作分别为第一部：《列宁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史》和第三部：《法西斯阴影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本书译成中文共约二十多万字，内容分为两部分，共六章。第一部分涉及从1924年共产国际四大到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斯大林提出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理论这一时期在共产国际推行“布尔什维克化”方针的过程中，苏联领导人左右摇摆的战略对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不利的影响。第二部分是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总结了斯大林领导时期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政策，尤其是对中国政策的失败。

本书的译者把译稿送给我看，要求我为本书中文版写一篇供中国读者参考的评介文章。我读完这本译稿以后，谨写出以下的看法，求教于读者同志们。

首先，我要指出，这本书引用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纪录和托洛茨基档案中的若干资料，这对我们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别是研究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很有参考价值。

我认为，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的以下看法，也是可供参考

的：

第一，作者认为，从1924年列宁逝世到1931年资本主义大萧条时期，是共产国际推行布尔什维克化和作者所说的“斯大林化”时期，也就是共产国际以苏联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为理由，要求各国党成为服从于苏俄利益的工具的时期。布尔什维克化运动使共产国际以及在国际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苏联，大大加强了对各国共产党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使苏联和共产国际逐渐合为一体，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可以任意干涉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其结果是使因十月革命的鼓舞而产生的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被毁坏，而且国际共运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也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第二，作者认为，促成上述变化的两个原因是：（一）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为控制苏共和苏联所进行的内部斗争，即斯大林同苏共内部的反对派进行的激烈斗争；（二）苏联的外交政策从国际主义政策到俄国传统的民族主义的强权政治的转变。同时作者客观地指出，在推行俄国传统的民族主义的强权政治的对外政策这一点上，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同斯大林是一样的。

第三，作者在对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作了分析以后，又说，如果认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布尔什维克以世界革命的名义而进行扩张的一种阴谋，那却是不正确的。苏俄的外交政策并没有从外国党的活动中得到好处。这可以举出两个例子：（一）共党国际对英共的政策，造成了英国和苏联外交关系的恶化；（二）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无条件地与国民党联合，最后也没有能保护俄国在中国的利益不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侵犯。

第四，作者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的严重失误，作了基本上是客观的叙述和评论。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屈服于共产国际的压力执行它为中国革命制定的右倾方针，使自己成为国民党的附属品，1927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远距离的错误指挥。结果中共不但被迫承受失败，而且还要



为此遭受责备。但是，后来中国情况发生了变化。作者說，毛泽东从总结中国革命失败的經驗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将馬克思列宁主义与传统的中国式的农民起义结合起来，取得了胜利”。在这里，作者的用語是不夠准确的，不应当說“与传统的中国式的农民起义结合起来”，而应当說“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但作者要表达的主要意思是正确的。

其次，我认为还应当指出，作者站在西方馬克思主义的立場上，对某些重要問題，也作出了片面的和錯誤的論断。

第一，作者在评价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評論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問題时，犯了片面性的錯誤。关于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他只是指出了共产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內起了消极作用的一面，而没有指出共产国际建立初期对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所起的重大的积极作用的一面。

周恩来在1960年7月所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說：“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共产国际在建立的初期，闡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則，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划清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界限，也批判了‘左派’幼稚病，发揚了国际主义精神，动員了各国革命人民拥护苏联，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革命运动”。周恩来的这个論断，是以人所共知的事实为根据的，它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問題，作者只指出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后期对中国“远距离指挥”造成大革命的失败的一面，而没有指出它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給予重大的帮助的一面。

共产国际、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重要帮助包

括：（一）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二）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成长，帮助他  
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初步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中来，  
正确地認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  
前途，初步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綱領和进而实  
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最高綱領。（三）共产国际和苏  
联援助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而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大  
革命初期和中期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使这次  
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而中国共产党也走出了党员不足五百人的  
狭小圈子，而变成拥有党员近六万人并享有巨大威望的群众性的  
党。（四）共产国际和苏联虽然继1927年放弃統一战綫中的領  
导权的右傾錯誤以后，在指导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方面又走到另  
一个极端，犯了不要統一战綫的“左”傾冒险主义錯誤，使中国革命  
在1934年又一次遭到了严重的失敗，但共产国际和苏联还是支持  
和声援了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五）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抗  
日战争时期虽然又一次犯了类似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同資产階  
級組成統一战綫問題上只要联合、不要斗争的右傾錯誤，但他們  
还是援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援助是全部交給国民党的）。  
在1937年到1940年，苏德战争爆发以前，苏联曾經是中国抗战的  
主要援助者，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又决定性地加速了日本  
帝国主义的投降（但与此同时，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时又提出了严  
重損害中国主权的条件）。（六）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  
曾經犯过不許中国革命、不許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战争去反对蔣介  
石的反革命战争的錯誤，但苏联本身的存在和苏軍的解放东北，  
又是对中国解放战争的实际支持和巨大援助。

因此，<sup>⑤</sup>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說：  
“研究国际經驗，要全面地看問題。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錯  
誤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  
产国际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許革命的

少。我們頂一頂，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見，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点錯誤。他的怀疑一經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們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們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周恩来的这个論断，也是以人所共知的事实为根据的，它的正确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作者沒有看到，共产国际后来所以产生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消极作用，是同在国际共运中实行高度集权的組織原則、共产国际和苏联力求成为各国革命的领导中心这个根本問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因为作者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尽管他批判了国际共运中的一个中心論，但又主张所謂多中心論。他不知道，無論是一个中心还是几个中心，都是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独立自主的原則，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平等联合的原則，并且同馬克思主义理論必須同各国的实际相結合的原則相矛盾的，所以最終都是不利于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的。这个問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关系太大了，所以我想在这里多說几句。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他們又說：“如果不是就內容而是就形式來說，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当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他們还說：“因为无产阶级必須首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的‘民族的’一詞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共产党宣言》在讲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为了改变全部生产方式所应当采取的措施时指出：“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宣言》中所发挥的共产主义的“一般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

史条件为轉移”。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1894年1月所写的《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一文中說得更加明白。他指出，怎样把馬克思主义的一般策略运用到各国去。“这必須因地制宜地决定，而且必須由处于事变中心的人来决定”。

正因为这样，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同国际主义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正是它的前提。恩格斯在1893年6月20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說：“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間，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們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之中。”

列宁也反复說过，对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即使是在西欧各国也是各不相同的，至于情况不同于西欧的俄国，以及与俄国情况也不相同的东方各国的共产主义者，更必須独立地掌握和运用馬克思主义理論，以便找到自己应当走的革命道路，形成自己的正确的革命理論。他在1920年所写的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說：“正确的革命理論”，“只有同真正的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終形成”。列宁早在1906年所写的《卡尔·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译本序言》中，就談过这个问题。那时，考茨基还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列宁說，听一听考茨基这个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意見是很有好处的，但“考茨基不会輕率地空談他所不熟悉的俄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列宁接着強調地指出：“在工人政党中，决不容許从旁边、从远处解决当前政治中实际而具体的问题。每个国家进行实际斗争的先进的自觉的工人集体，永远是解决所有上述问题的卓越权威。”

但是我們知道，和馬克思主义理論必須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在国际联合中必須保证各国党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这两个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矛盾，共产国际则是按照民主集中制这一只适用于各个国家的共产党本身处理党内问题的組織原則建立起来的。按照《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十七条的規

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当时，列宁为了防止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滥用权力，又作了这样的限制性规定：“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同时必须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但是我们应当说，这个限制条件的规定是不明确的，也是不够的。）这种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诚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势必不利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各国的具体实际正确地互相结合，势必损害各国党的独立自主。这种弊病，还在共产国际建立的初期，当列宁还在世时就表现出来了。列宁于1922年11月在共产国际四大作报告时就指出，共产国际三大因为通过只是根据俄国经验写成的组织问题决议，而“犯了很大错误，就是我们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而且早在共产国际建立以前，列宁1919年3月在俄共（布）八大所作《关于党纲报告的结论》中就曾说过，应当让其他国家（例如波兰）的共产党人选择不同于俄国的道路，而“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

但是共产国际的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是同列宁的上述愿望相违背的。列宁死后，在斯大林领导的时期，共产国际进一步按照苏联党的模式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制度。共产国际执委会按照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方式组织起来了，并被要求“必须干涉每个党的内部事务”。在执委会中，俄国党占有领导地位，在执委会和它的各个工作部门担负最重要的职务；然而其他党被选入执委会的代表却必须取得执委会的充分信任，而且不以各国党的代表而以个人资格被选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切重要决议都是事先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国际执委会还被赋予向各国党派派遣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和指导员的职权，这些代表或指导员有监督和指导各国党的一切活动的责任。同时，各国党被要求“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

的国际纪律”，他们“必须服从”并“毫不迟疑地”执行国际执委会的任何指示。这样，以苏共为核心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成为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对各国党“发号施令”的领导机关，而且它的号令不论正确与否，各国党都必须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这种高度集权的制度，在苏共领导人对于同他的远隔万里的各国的具体情况又是完全不熟悉的情况下，必不可免地要产生主观主义的瞎指挥。这种瞎指挥同俄国民族利己主义相结合，只能堵塞各国党取得成功的道路，只能把各国革命引导到失败的结局。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就是一个证明；1934年中国革命再次失败又是一个证明。

第三，作者正确地指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实行无条件联合的右倾错误，指出正是这种错误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但是他没有看到，这决不能说明采取党内合作方式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根本上不正确的。历史证明，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组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正确的，没有这种合作，就不可能有大革命初期和中期的巨大胜利。问题不在于实行国共合作，不在于同资产阶级组成了统一战线，而在于共产国际、斯大林、陈独秀放弃了工人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回顾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在1927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是说的陈独秀、彭述之和张国焘，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这样做是执行了同他们的右倾思想相符合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放弃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右倾指示的。

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斯大林提出了一种把民主革命阶段和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截然分开，而不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就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相类似的）。按照这种理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包括在他所谓的民族革命时期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领导权的，只有“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苏维埃革命阶段”，才能实现这种领导权。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张实行放弃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策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主要表现在：

（一）他们主张实现国民党的领导权，而反对共产党取得对国民党的领导权。斯大林在1925年5月的演说中就指出，在象中国这样的工人阶级人数很少的国家中，工人阶级应当通过国民党这样的所谓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即所谓工农党“为媒介”，“对革命实行实际领导”。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通过取得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去“对革命实行实际领导”，而是说要实现共产党人不能在这里面“做领导工作”的国民党的领导权。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会议在1926年11月通过的决议中就明确规定：共产党应当“组织（国民党的）左派并与之亲密合作，而不要企图代替他们去做领导工作”。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被共产国际明令禁止在国民党内“做领导工作”的，更不用说取得对国民党的领导权了。直到1927年5月汪精卫叛变革命时，斯大林还提出“一切政权归左派国民党”的口号（按：“左派国民党”不包括共产党人，因为根据共产国际的规定，“共产党”是同“国民党左派”分开的）。同共产国际、斯大林、陈独秀的主张相反，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主张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应当是去做客人，而应当是去做主人的，他们都主张共产党通过取得对国民党的领导权来实现工人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而且，当时这样做也是完全可能的。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在领导权问题上，1924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领导已经有了雏形，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共产

党已經起了领导作用。……但是党中央在那个时候放弃了领导权。”

(二) 他們主張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推动国民党去“开展”和“加强”农民土地革命运动，这就是說，要把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也拱手奉送給资产阶级、国民党和国民政府。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會議的決議、1927年5月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談話》以及同年5月国际执委会八次會議的決議和随后发出的緊急指示都是这样說的。斯大林的《談話》說：“武汉政府……应当大力支持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土地革命。”共产国际的緊急指示說，武汉国民政府应当加强土地革命运动。否則这个政府“就会威信扫地”；而且还說“要反对过火行为，不过不应当使用军队，而应当通过农民委员会”。

(三) 特别是，他們一直不贊成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而把对军队的领导权也自愿地送給了国民党、资产阶级。周恩來說：“本来我們應該在广东革命政权的时候就抓军队，而且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党中央在那个时候放弃了领导权。”1926年11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會議的演說中作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著名論断，但他所指的是国民革命軍对北洋軍閥军队进行的北伐战争；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认为他們只应当限于：第一，在国民革命軍中加强政治工作，使这个军队真正体现革命思想，防止它的腐化；第二，“学会軍事，并逐渐前进担任军队中的某些领导职务”。直到1927年5月13日他在《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談話》中仍然认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即“紅軍”，还是“从前来看一定要注意的問題”，而在当时要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代替現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共产国际在1927年5月底的指示中要求緊急編組由两万共产党员、五万工农組成的几个新軍，但它的任务只是充当武汉国民政府的“近卫軍”，是用以解除对武汉政府“不可靠的军队”的武装的。



总之，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不是由于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而是由于放弃了对革命和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与此相反，1934年中国革命的又一次遭到失败，是由于实行了不要统一战线的冒险主义政策。正是鉴于这两次失败，毛泽东说：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胜利的。”

第四，与上述错误判断相联系，作者对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政策的批评，也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他在论述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罗易的《补充提纲》时，似乎认为两者是截然相反的，并且似乎认为列宁主张联合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是不正确的，而罗易强调某些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反动倾向却是完全正确的。作者没有看到上述《补充提纲》只是对《提纲》的补充，它们不是对立的。作者也没有看到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仍有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是正确的，不这样做是不正确的，但在同资产阶级联合中，无产阶级必须保持独立性和争取对革命的领导权，并且为此目的，要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诚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中是解决了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依靠了农民这个革命的主力军对革命的武装斗争的坚决的拥护和支持，而且是依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的占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拥护和支持。

第五，作者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赞扬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赞扬卡尔·科尔施、格奥尔格·卢卡奇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论，而贬低恩格斯（说他主张“决定论”）和列宁（说他是“实用主义的”），并且说：“共产主义运动已不